

汤用彤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贡献

杨 会

汤用彤先生(1893年—1964年)字锡予,湖北黄梅人,生于甘肃通渭。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。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。他对中国佛教史的梳理,对魏晋玄学的开掘为中国文化史,中国哲学史的确立打通了难关,受到国内外汉学、佛学研究学者的普遍推崇,这与他一贯的治学态度、研究方法和秉持的理论是分不开的。

首先,治学态度——同情默应,心性体会。汤先生在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的跋中写道“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。佛法,亦宗教,亦哲学。宗教情绪,深存人心,往往以莫须有之事实为象征,发挥神妙之作用。故如仅陈迹之搜讨,而无同情之默应,必不能得其真。哲学精微,悟入实相,古智慧发天真,深思明辨,往往言约旨远,取譬虽近,而见道深弘。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,而发心性之体会,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。”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学,实际是一种人生哲学,因而历史研究者必须以心性体会,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时人的心态去考虑和体会,才能去伪存真,扬弃糟粕,取其精华。这也体现了一种近代学问大家的中正不倚的态度。

其次,考证与比较的研究方法。汤先生的汉唐佛教史研究是致力于佛教史研究者的工具与导引,至今近一个世纪尚没有能超越者,重要的原因就是 he 搜求广泛,考订详细,并在考证的基础上得出平时的结论。他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作为佛教史研究的根底,引证了几乎与之有关的所有历史文献。从正史到野史,从学术著作到笔记体小说,从历代僧传到各种索引,从内典因明到诸子百家,前及周世传说,后至近人《佛典泛论》;上有帝王诏书、下有礼俗之谈,既有巴利文、梵文原典,又有英美日本的历史文献,古今中外有用的材料,只要对治学有益,汤用彤先生尽量搜掘。

再次,文化移植理论。中西文化交流的讨论一直是知识界的热点问题。二战爆发后,有关于此又发生了文化的前途到底如何的讨论。当时有人主张中国文化本位,有人主张全盘西化。汤先生指出外来文化思想与本有文化接触时,问题有两点:一是我们不应该接受外来文化,这是价值的评论;一是我们能不能接受外来文化,这是事实问题。由此,他提出了“文化移植”一词,并解释为“这就是指一种文化搬到另一国家和民族而使它生长”。文化人类学对此有三种学说,汤先生赞成第三种,认为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接触,其结果是双方的而不是片面的。即主张第一,外来文化可以对本地文化发生影响,但必须适应本地的文化环境。第二因为外来文化也要适应本地文化,所以也需适者生存。因为一种文化类型往往具有一种保守或顽固性,虽受外力压迫而不退让,所以文化移植的时候不免发生冲突,所以外来文化必须调整以适应本土文化。他认为外来思想输

入需要经过三个阶段:(一)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;(二)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;(三)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。在第一阶段,调和是表面的,并未深入,第二阶段比较深入,第三阶段外来文化思想已经被吸收,加入本土文化血脉中。此时两种文化都发生了变化。

汤用彤先生学术成就中,最卓越的是汉唐佛教史研究,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,集中反映在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和《隋唐佛教史稿》两书中。在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一书中,作者分为汉代佛教和魏晋南北朝佛教两部分。第一部分主要是考证了佛教入华诸说、永平求法传说、四十二章经、汉代佛法之流布,并根据历史文献中对于汉代佛教的记载和佛道的比较,从教理和行为两个方面阐明汉代佛教的性质实为一种道术,可称为“佛道”。第二部分讲了当时的名僧,包括其生平、履历、在佛教方面的造詣及贡献,其中重点讲了释道安、鸠摩罗什及其门下、释慧远、竺道生;佛教南北之区别及对隋唐的影响。汤用彤先生认为,魏晋时期,中国学术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,玄学开始盛行,佛教开始玄学化。他深入研究了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——安世高、康僧会一系的小乘禅学和支谶、支谦一系的大乘般若,并认为支谦之学主明本、重智慧,与玄学合流,直接影响了两晋南北朝的佛学风气,佛教的玄学化实际始于支谦。而释道安则为佛法的兴盛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。南北朝时,佛教呈现南华北淳的不同学风。后来隋唐统一,佛教发展又开辟了一个新时代。在《隋唐佛教史稿》中,汤用彤先生指出隋唐区别于前代后世的特点,具有统一性、国际性、自主性或独立性、系统性的特性,同时指出隋唐佛教“有如戏剧的顶点,是高潮的一刻,也正是下落的一刻”即佛教在隋唐时发展到鼎盛,但盛极必衰,到了五代时因精神非旧,又受孔教复兴的排斥,仅剩躯壳。另外,他指出在中国“宗”有二意:一是学派,一是教派。隋唐之前,中国佛教主要是学派的分歧,之后,因为各派争道统,各种教派便兴起了。

汤用彤先生在学术上的另一成就是魏晋玄学研究,《魏晋玄学论稿》便是其成果,另外还留有大量的讲演提纲、研究提纲等,涉及了魏晋玄学的重大问题。自汤用彤先生开始,学界才统称魏晋思想为魏晋玄学。他首先从《人物志》着手,分析汉魏之际的时风及其对玄学兴起的影响,并总结出魏晋清谈区别于汉代清议,指出原因:一在于正始以后学术兼接汉代道家之绪,老学的影响逐渐显著,二是清谈久了,便由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,是学问本身演进的趋势。汤用彤先生窥一而知全豹,通过分析与解释,揭示出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变迁发展。在书中,他花大量篇幅深究王弼的思想,提出两个问题(一)玄学的产生是否受佛学的影响?(二)这种外来的宗教何以能为中华人士所接受?要回答此问题必须先明了魏晋时期特有思想的生成和发展。他将此时代的思想分为两个方向:一为旧学,以阴阳五行作为间架;二为新学,以“虚无之论”为基础。进一步指出魏晋时代“一般思想”的中心问题为:“理想的圣人之人格应该怎样?”因此而有自然与名教之分。作者认为王弼《解易》以“得意”即“寄言出意”的理论为根据,鄙视汉代的“象数之学”,抛弃阴阳五行等就说的传统,从而奠定魏晋玄学的基础。并指出玄学的生成有两个因素并得

新学术

出,玄学的产生与佛学无关,玄学是从中华学术自然演进,从过去思想中随时衍出新义,渐成系统。玄学与印度佛教在理论上没有必然联系,换言之,佛教并非玄学产生的原因。倒是反过来,佛教先受玄学的洗礼,才为我国人接受,当然佛教后来对玄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他将魏晋思想发展分为四个时期:(一)正始时期,在理论上多以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为根据,以何晏、王弼为代表;(二)元康时期,在思想上多受《庄子》学的影响,“激烈派”的思想流行;(三)永嘉时期,至少一部分人上承正始时期“温和派”的态度,而有新庄学,以向秀、郭象为代表。(四)东晋时期,亦可称“佛学时期”。指出魏晋思想的源头从汉末三国时期荆州一派《易》学与曹魏“形名家”的综合说起,到正始以下至元康、永嘉、至东晋的变迁,始终代表玄学继续发展的趋势,前后虽有不同的面目,但在思想本质有一贯的精神,这也是魏晋思想的特殊性所在。

作者单位: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

参考文献:

- [1] 汤用彤,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,上海书店,1991年版
- [2] 王欣瑞,《汤用彤中国佛教史研究方法探析》,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(社科版)2006年1月
- [3] 汤用彤,《魏晋玄学论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版